学术专论

太平天国战争后江南士绅的官缺候选、家族重建与文化追求

——以同治九年顾文彬的家书为中心

冯贤亮

[摘要] 同治九年，苏州乡绅顾文彬前往北京，开始了漫长的候选官缺活动。当年共计二十九通的家书，内容丰富，涉及顾文彬候缺的详细举动、书画收贩的理念与实践、苏州育婴堂事务的处置、顾氏家事的安排以及孙辈研习书画鉴藏的要求等内容，是顾文彬与家人观念世界沟通的重要表现。同治九年是太平天国战争后顾文彬在苏州重建顾家进程中的关键一年，为顾氏官场地位的再度攀升、家业保存、过云楼的收藏等奠定了重要的现实基础。从顾文彬家书写述的私人领域出发，可以窥探战后官场仕途重建的独特面貌与政治延续中的生活日常，也可以进一步体察士人的理想追求和大时代的脉动。

[关键词] 同治九年 顾文彬 候选 家族重建 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 K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3）－01－0124－014

一、引言

太平天国在江南的闯入，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清王朝与之展开的战争，对于地方经济、政治统治、生活秩序的破坏，是相当严重的，也对城市发展格局及士民百姓的人生产生了巨大影响。[①] 本属江南地区核心的苏州，因此丧失了中心地位，其经济资本与文化建设出现了向上海发展的地域转移之态。[②]

在战争结束后，从苏州外逃的人们，还有很多回到了苏州城内。[③] 城市的荒落残破，使返城的苏州人有了异乡之感。[④] 面对兵燹后百废待兴的生活境况，地方士绅积极行动，推动了战后社

[收稿日期] 2022-05-07
[作者简介] 冯贤亮（1971— ），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 200433；vonxl@163.com

① 周武：《太平军战事与江南社会变迁》，《社会科学》2003 年第 1 期。
② 内藤湖南：《燕山楚水》，中华书局，2007 年，第 90 页。
③ 毛祥麟：《墨余录》卷 2，“甲子冬闱赴金陵书见”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 18 页。
④ 石渠：《山塘除夕》，徐文高、夏冰编注：《山塘古诗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41 页。

会经济与生活日常的恢复工作。其中，被李鸿章高度称赏的地方士人中，就有携家从上海回苏不久的顾文彬："办理善后，尽心筹画，乡里公事，赖其经营者不可殚述"；顾文彬在苏城克复后的表现，"颇为士民所怀"。[①]

顾文彬（1811—1889），字蔚如，晚号艮庵、过云楼主，苏州府元和县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顾文彬考中进士，授官刑部主事，历任福建司郎中、湖北汉阳知府、武昌盐法道等，咸丰十年（1860）以丁父忧去职，时苏州已经陷落，被迫避居上海。在职期间，顾文彬务求廉明平恕，深得巡抚胡林翼赏识器重，被目为"端人正士"，[②] 同治九年（1870）底，候缺补授浙江宁绍台道，结束了丁忧在家及其后的闲居生活。[③]

传统的官僚政治，给予做官的人、准备做官的人以及从官场退出的人以各种社会经济的实利或种种十分实在的特权，[④] 也方便他们在社会上取得领导权。如赖特·米尔斯所言，这些权力精英，拥有比普通人更多的资产和更宝贵的经验，属于地位显赫之士。[⑤] 顾文彬显然属于苏州地方的权力精英，有着有钱、有闲阶级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表现，[⑥] 但他仍有意识地努力向上攀升，以更好地应付来自各方面的难题，抬升家族整体的力量。

同治九年，是顾文彬北上候选官缺的重要一年，也是太平天国战争后顾文彬在苏州重建顾家进程中的关键一年，与其后很多年份相较，显得并不平凡。目前所见的顾文彬家书即《宦游鸿雪》第一册，即起自该年。该年收录的家书编号的不过26通，不编号的只有3通，并不多，绝大部分是从北京寄往苏州家中，收信人是其第三子顾承（原名廷烈，字承之）。顾文彬的长子廷薰曾在湖北长期陪侍他的行政工作；次子廷熙生平无他好，唯嗜书画、碑帖等物。[⑦] 他们与顾文彬的第一任妻子浦氏在咸丰十年相继去世。[⑧] 三子顾承只是一名附贡生，在顾文彬北上后，全面负责家族事务。后来，顾承在光绪八年（1882）先顾文彬而逝。[⑨]

在家书中，顾文彬频繁提及的一些师友，大多是他于政界、艺界、商界交往活动的重要人物。像同乡冯桂芬出现的频率就非常高，是顾文彬安排苏州地方事务中的关键人物。他们都可算林则徐在苏州任职期间的学生。冯桂芬与潘世恩、李鸿章等人交好，自己又培养了吴大澂、叶昌炽、陆润庠、王颂蔚（王鏊的后裔，在顾文彬逝后为其撰有墓志铭）等学生。顾文彬在进入仕途后，与官文、左宗棠、潘祖荫等人也有比较复杂的人际关系。[⑩] 同治九年顾文彬再次到北京后，类似的社会交往关系依然庞大，在顾氏候选期间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顾家的发展以及顾文彬本人社会身份的重塑以及书画收藏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以往对顾文彬的研究，重点多在过云楼的崛起、顾文彬的书画鉴藏活动以及晚年生活，[⑪] 大

---

① 李鸿章：《顾文彬建专祠片》（光绪十六年五月初三日），《李鸿章全集》奏议十三，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72页。

② 民国《吴县志》卷61下《列传七》，苏州文新公司，1933年，第12a页。

③ 王颂蔚：《皇清诰授荣禄大夫一品封典赏戴花翎布政使衔浙江宁绍台道顾公墓志铭》，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79–180页。

④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时代文化出版社，1948年，第172页。

⑤ C. 赖特·米尔斯：《权力精英》，李子雯译，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9年，第8页。

⑥ 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徐泓译注，联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189页。

⑦ 沈慧瑛：《过云楼主人顾文彬家世考略》，《档案与建设》2018年第1期。

⑧ 施林霞：《顾文彬的家庭生活研究——以〈过云楼家书〉为中心》，《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

⑨ 王颂蔚：《皇清诰授荣禄大夫一品封典赏戴花翎布政使衔浙江宁绍台道顾公墓志铭》，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第180页。

⑩ 高福民编著：《过云楼梦：大变革时代江南文脉之一隅》，文汇出版社，2017年，第1–3、17–18页。

⑪ 陶大珉：《过云楼顾氏家族书画鉴藏活动研究》，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陶大珉：《从过云楼到怡园：顾氏书画鉴藏及其艺术交往》，樊波主编：《美术学研究》第一卷，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22–471页；沈慧瑛：《从〈过云楼日记〉看晚清士绅生活图景》，《档案与建设》2015年第8期；张燕：《顾文彬及其〈眉绿楼词〉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沈慧瑛：《解读〈过云楼家书〉》，《档案与建设》2017年第4期；李军：《苏州顾氏及过云楼收

致可以拼凑起顾文彬的人生历程与生活世界版图，可以揭示出那个时代很多士人的一般生活样态。顾文彬的家书，已引起学界较多的关注，与很多官员的日记一样，也是窥察晚清官场及士人家庭生活的重要资料。[①] 就同治九年而言，可谓顾文彬仕途生涯后期最具关键意义的年份，为顾氏官场地位的攀升、家业保存、过云楼的收藏等奠定了现实基础，在过往的研究中着墨不多。[②] 这一年，除了在京长期的候选外，顾家参与的苏州育婴堂、典当业、家族教育、子孙培养等内容，都十分重要，值得进一步分析。从这种生活史出发的考察，当然也需要注意日常生活与历史变动的联系，[③] 可以挖掘出比较重大的问题，以及政治生活在背后的关键性影响。

因此，本文以同治九年顾文彬的家书写述为中心，[④] 从微观的视野，对顾氏入京候选、书画收贩、家事安排等，作一初步的梳理，呈现时势变化下顾氏对于政治发展、家族延续的基本理念与晚清官场生活的"规则"，从而更好地揭示"同光中兴"时期官绅的生活面貌、仕途经营、社交态度与人生志趣等，充实对于晚清社会重建以及士人因应政治变化的生活论述。

二、北上京城的安排

太平天国战争平复后所谓的同治中兴，[⑤] 是呈现晚清中国宏大图景的一个重要话语，关涉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内容。而王朝统治的重建中，大量官吏的任用安排，其实是比较重要的政治行动。很多人像顾文彬这样，准备重新进入仕途，以因应时代的变化。

作为一名即将起复的官宦，顾文彬在家书与日记的表达中，既有对战争之后仕途发展的价值的深刻认识，也怀持对社会生活的丰富情感和文化理想的追求。特别是那些家书及其意愿表达，是以一个家主的立场，通过儿子顾承的接收，传递至顾家的全体层面，让顾家人甚至包括顾文彬的师友亲朋都能感知他的态度与看法，从而将个体、家庭与社会的关联变得紧密起来。由此，对家书中呈现的人物命运、日常生活与政治脉动的互动窥察，就显得不再平淡乏味。

从同治九年正月初一日开始，除了正常的节庆和游玩娱乐外，顾文彬还与苏州的官场朋友（如冯桂芬、盛宣怀、潘季玉、王曾樾、贾芸樵、汪秉斋等）小聚；十一日和十六日顾文彬还专门就其主持管理的育婴堂，与吴县人程味亭（程肇清，即顾文彬经常提及的"味老"）、冯桂芬等商讨经费、堂田等事。[⑥]

经历咸丰十年以来的时事挫折与闲居生活，顾文彬准备入京候选起复。关于这一点，他专

藏》，《中国书画》2017 年第 2 期；陶莉：《过云楼顾文彬艺文社交初探》，《文教资料》2018 年第 6 期；施林霞：《顾文彬的日常生活研究——以〈过云楼日记〉〈过云楼家书〉为中心》，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 年；范金民：《晚清江南士大夫的致仕生涯——以顾文彬为中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1 期。

① 有关晚清官场的日记研究，可参马忠文：《私密中的真相：从书信日记看近代中国政治》，秀威咨询科技股份公司，2020 年；邱捷：《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年；张剑：《晚清日记中的世情、人物与文学》，凤凰出版社，2022 年；等等。

② 相关研究可参沈慧瑛：《从〈过云楼日记〉看晚清士绅生活图景》，《档案与建设》2015 年第 8 期；曹慧芳：《读〈顾文彬日记〉看晚清官场》，《档案与建设》2020 年第 7 期；阚红柳：《从〈顾文彬日记〉看晚清琉璃厂书画文玩交易》，《北京社会科学》2022 年 5 期。

③ 常建华：《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观照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2 年第 1 期。

④ 家书较社会交往圈中常见的书牍，具有更多的私密性，呈现的个人意愿、情绪表达等相对直白而明晰，在这一点上，与真正密不示人的日记一样有着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家书中的公私信息，更能揭示作者的内心世界、真实情感，丰富政治史的研究基础。参刘萍：《家国之间——以李用清家书为基础的个人史研究》，《晋阳学刊》2021 年第 5 期。

⑤ 有关思想、政治、经济以及外交等方面的细致论述，可参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房德邻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

⑥ 顾文彬：《顾文彬日记》，同治九年正月十一日、十六日、十八日，文汇出版社，2019 年，第 2、3 页。

门与驻于苏州的江苏巡抚丁日昌会面商量，后者的影响力堪称巨大，且已答应帮他上奏力荐。[①] 三月初，顾文彬辞别丁日昌，从胥门码头上船，由张姬与朱妪陪伴入京。到初六日，才从上海向苏州家中发出了第一号信。[②]

家书是顾文彬观念世界沟通的重要媒介。顾文彬写的家书，喜欢按次编号，比较有规律。离家的第一号信，是寄给掌理家中诸事的儿子顾承。根据顾文彬在信中的详细说明，他们于同治九年三月初二日开船出发，先到昆山，次日到嘉定县的黄渡镇留宿一晚，初四日就到了上海（洋泾浜二摆渡），在船上住宿，初五日上岸，寓居租界的荣锦里椿记客栈。同时，顾文彬将寄给在北京的女婿朱研生的信，委托北行的轮船转送。[③]

初四日二媳过世、初六日出殡，顾文彬都不在苏州，但他知晓二媳临终遗言，曾嘱咐孙辈争气，为此很是感慰，认为志就是气，争气就是立志，建功立业，都需要由争气得来，希望孙辈禀守此志而终身行之。[④] 候船之际，他找朋友们聚饮、观剧，还看到了朋友们收藏的一些书画，甚至独自一人到长兴阁茶室消遣，还观看了花鼓戏表演，只觉得鄙俗可叹。[⑤] 上海在咸丰朝以来已是巨大的移民集聚区，在晚清的政治生活中有着深远影响，[⑥] 而且作为东南地区城市聚落的重心，上海在区域历史进程中具有了核心性。[⑦] 顾文彬在上海生活过，看到了上海拥有便利的现代交通网，才会绕道上海再行北上京城，而不是直接循着大运河北行的方式；苏州作为传统交通中心的地位，早已被日趋现代化的上海所取代了。[⑧]

顾文彬在上海一直等候“新南浔”轮船开船，这船虽散搭者也会有舱位，为方便家眷起居，计划于十五日后动身。[⑨] 坐船走海路，是出于尽快进京的考虑，成本不低。不料该轮船嫌货少不开，顾文彬等人只好搭乘“行如飞”轮船，船价是每人 15 两白银，包舱位的费用另计。[⑩] 十九日终于上船，二十四日就到天津了，寓居惇裕洋行。考虑到再由水路入京会耽误四月初一的投供，顾文彬决定坐车入京。[⑪] 二十六日乘车，二十八日就到北京了。他们六辆轿车的队伍，规模并算不小。女婿朱研生迎接他们入住西河沿公馆，公馆西边楼下的两间房子，正是二十年前顾文彬安排朱研生入赘顾家的新房。顾文彬认为这是一种奇缘。到这里，因交通、食宿等各项开销以及进城税局的需索，他们所带的银两已费去一半了。[⑫] 具体来说，顾文彬的车进沙窝门时，被门卫敲诈了京钱 3 千；同样，行李被城门守卫和税局多方需索，顾文彬只能托相熟的叶恒泰店友陶醇甫关说，到上灯时分才放回，共费税银 20 两（按每箱 4 两计算），另加京钱 60 千。[⑬]

顾文彬原计划于四月初一日到衙门投供，这时也来不及了，只能到五月初一再投供；而且到衙门投文，需穿正式的袍套，他并没有准备，重新置办单纱套与纬帽各一件，又是一笔额外之费。[⑭] 到京城的第二天，顾文彬就迫不及待地赶往琉璃厂，先洗浴，再到博古斋与朋友李老三

---

① 顾文彬：《顾文彬日记》，同治九年二月廿五日，第 7 页。

② 顾文彬：《顾文彬日记》，同治九年三月初一日、初二日、初六日，第 7 页。

③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苏州市档案局（馆）、苏州市过云楼文化研究会编，第一号，同治九年三月初五，文汇出版社，2016 年，第 3 页。

④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二号，同治九年三月初七，第 4 页。

⑤ 顾文彬：《顾文彬日记》，同治九年三月十一日、十二日，第 9–10 页。

⑥ 行龙：《论太平天国革命前后江南地区的人口变动及其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 年第 2 期。

⑦ 长泽规矩也：《中华民国书林一瞥》，内藤湖南、长泽规矩也等：《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中华书局，2006 年，第 212 页。

⑧ 柳肇嘉编著：《江苏人文地理》，大东书局，1930 年，第 90–92 页。

⑨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四号，同治九年三月十三日，第 5 页。

⑩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五号，同治九年三月十八日，第 6 页。

⑪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六号，同治九年三月二十五日，第 7 页。

⑫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七号，同治九年三月晦日，第 8 页。

⑬ 顾文彬：《顾文彬日记》，同治九年三月廿八日，第 11–12 页。

⑭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七号，同治九年三月晦日，第 8 页。

会面，看到了要价40两的一幅王翚临王蒙长卷与标价也是40两的元人方从义小立轴，因价昂而不能买。[①] 琉璃厂一带，从清中期以降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古文献与书画古董的集散中心，顾文彬出入其间的书画收贩活动，实际上也以其一人之力，促进了南北书画的交流。[②]

顾文彬在闲暇时常往琉璃厂游逛，与他交往谈得来的，旧相识中只有博古斋的李老三、松筠庵的心泉和尚，新知中是松竹斋的张仰山。这些人对顾文彬在京的社会活动与候缺工作，具有直接和间接的作用。顾文彬带到北京的书画，就委托李老三估价（一箱书画，三十余件），结果与顾承的估计相差无几。顾文彬发现，在北京的书画市场上，比较受重视的，还是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恽寿平、吴历这清初六大家，以及明代苏州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的作品。顾文彬比较高兴的是，他所带之物都很合销路。同时他发现，尽管李老三在京城的文物市场上算得上巨擘，但与他们顾氏父子相比，鉴识水平还是相差较远，王翚的两册仿作，就是由他成功销售的。顾文彬的另一个发现，则是京官中虽有不少爱好书画者，但大多没有实力购置，能买的都会拖欠银两，反不如外官有实力。[③]

顾文彬非常注意运用其书画古董鉴藏方面的声名，结交同好，深化交往关系，并经由这样的活动，稳固并扩大了官场的交往圈。

三、漫长的候缺与书画收贩工作

顾文彬在京的社会交往与书画贩卖，自有其社会网的帮助。四月初五他还费一天的时间，到处拜访师友；初六日托人往吏部投供之际，又拜访了许庚身（字星叔，曾任军机章京等职）等人，当晚仍到博古斋与李老三交流书画销售情况。[④] 这些人对他的候选与书画经营活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四月初八与初十日两天，他都与老师官文（曾任直隶总督等职）相聚商谈，[⑤] 应与候缺问题相关。在京的候缺虽然需要时间等待，但更重要的是面对竞争激烈的官场利益争夺，需要有力的关系网络照护，这都要顾文彬这样的官位需求者耗费巨大的精力与财力来搏取。顾文彬的行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在制度史的框架下官员选任的实态及其复杂性，[⑥] 以及王朝统治进程中官场权力（利益）分配的具体内容。

顾文彬深深地感到，在倾顾家全力经营仕途的关键时刻，投供、候选已让人无比不安，生活压力更是沉重。他考虑的应对策略，是利用他的爱好与专长，在候选期间兼做书画客，既可以减轻经济压力，也能让他觉得生活追求更有意义。四月十五日给顾承的信中，顾文彬详细阐述了书画的收卖原则，以及所知的收藏情况，以为下一步顾家在这方面发展的指导。同时，从家族传承的角度，他强调了孙子们学习书画知识的必要性与紧迫性。[⑦]

与顾承有规律的书信往返中，顾文彬对赴京后最重要的事情，都作了详细的陈述。当然，人际关系的应酬或请托，显然是官位候缺的要务。四月二十日，顾文彬前往拜谒吏部右侍郎彭久余，委托其催办投供公事。中午他就到京城的长元吴会馆，参加苏州同乡的公请活动；

---

① 顾文彬：《顾文彬日记》，同治九年三月廿九日，第12页。

② 阚红柳：《从〈顾文彬日记〉看晚清琉璃厂书画文玩交易》，《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

③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八号，同治九年四月十五日，第9页。

④ 顾文彬：《顾文彬日记》，同治九年四月初五日、初六日，第13–14页。

⑤ 顾文彬：《顾文彬日记》，同治九年四月初八日、初十日，第13–14页。

⑥ 有关清代文官选任分类的制度史论述，可参傅宗懋：《清代文官缺分之研究》，《台湾政治大学学报》第21期（1970年）；何平：《清代的官缺制度》，《文史杂志》1990年第1期；杜家骥：《清代官员选任制度述论》，《清史研究》1995年第2期；张振国：《现任、候选与候补：清代文官之分类》，《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⑦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八号，同治九年四月十五日，第10页。

二十九日，他又去见彭久余，托其招呼进单。[1]这种候缺之际的紧张感，顾文彬写述得相当简单。或许作为官场中的老人，顾文彬熟悉其中的套路，也有其不耐烦的心理存在。给顾承的信中，他就说候选进单，是人谋已尽，何时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只能听天由命。[2]

五月初一日，顾文彬准时到吏部投供，并谒见官文，两人有一番长谈。至于谈了什么，顾文彬没有记录。努力经营仕途，是顾文彬的本分。这时他已六十岁了，为家族发展考虑，仍不得不努力前趋。此后让他高兴的事，是在松筠庵心泉和尚那里，见到了智永真草《千字文》卷、杨涟奏稿卷、浙江和尚山水小卷、董其昌仿赵细笔设色山水轴、徐幼文山水小轴、恽寿平《睡鸟图》轴、吴历仿王蒙立轴、王鉴仿倪瓒轴。[3]

在经历了太平天国战争的巨大挫伤后，社会经济衰残。而在书画市场，正是流散与收藏的重要时期，留给顾文彬这样勤于收卖的人以很多机会。买卖书画是顾文彬父子家书中讨论最多的内容，占据了家书中的大部分篇幅，可以说是顾文彬官宦生涯的精神与物质支撑。[4] 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对顾文彬的仕途经营产生了助力。

顾文彬一直关注进单的工作，当中起着很大推动作用的，是他在书信与日记中经常提及的许庚身。到五月初六，他再晤许庚身，表达谢意。经过艰难的周折，进单终于到了军机处，他认为许庚身的功劳不小。[5] 进单从吏部移交至军机处，已过了关键一环，不料在军机处另有章程，须请旨缺才准进单。顾文彬不得不通过许庚身再委托相关人员将他的材料检出，予以特别关照，经军机大臣商议后，才可安排进单。这个过程，让顾文彬感到了惊险。据他在部里的友人相告，拣放必快，但他希望获得的道员之缺本不易下达，只有耐心等候。京城中的那些旧相知经常邀请他参加宴会，他觉得比较烦，但也不能推却。[6] 五月十九日，顾文彬索性前往西城，请善霞卿占卜简放之期，结果显示是秋季可得。[7] 这个预测，后来证明大致是准确的。

除了这些事务外，顾文彬将时间全部耗于书画方面，来往于德宝斋、博古斋、润鉴堂、松竹斋、论古斋、隶古斋等，搜罗相关信息，酌定书画的收或贩。顾文彬的收获有时候是颇丰的，既收有吴彬、唐伯虎、丁云鹏、仇英、祝允明、罗洪先等人的书画作品，也有古钱、古玉等物。[8] 其间比较惊喜的事，是顾文彬于论古斋看到了被他称为稀世之物的宋拓定武兰亭卷，笪重光藏本，后归高士奇，要价 100 两，他深知这个拓本的价值，携带回家，志在必得。[9]

但迫于经济压力，顾文彬心仪的书画，没有办法都如愿到手。顾文彬还准备了一册《所见书画录》，对其所经见的书画精品，作了登记，已有六十多种。[10] 到五月二十八日，顾文彬终于在论古斋一番讨价还价后拿到了宋拓定武兰亭卷、王翚十万图册，共费 80 两。这件事让顾文彬狂喜不已，他在日记中说近日快心之事，除军机进单外，以此事为最。他认为进单是分内之事，得到心仪的书画却是意外之喜。[11]

五月份在京的生活，顾文彬除了向顾承表示他投供部费又耗去数十两外，其他买单纱袍套之类，也需花费银子，已向叶恒泰挪借了曹平松江银百两。此外，书画市场的收获仍是比较大的，而北京的市场空间之大，令顾文彬叹服不已。顾文彬将收集的书画古董寄回苏州，开了单

---

① 顾文彬：《顾文彬日记》，同治九年四月二十日、二十九日，第 16–17 页。
②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九号，同治九年五月初四日，第 11 页。
③ 顾文彬：《顾文彬日记》，同治九年五月初一日、初四日，第 18 页。
④ 沈慧瑛：《解读〈过云楼家书〉》，《档案与建设》2017 年第 4 期。
⑤ 顾文彬：《顾文彬日记》，同治九年五月初六日，第 18 页。
⑥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十号，同治九年五月十四日，第 14 页。
⑦ 顾文彬：《顾文彬日记》，同治九年五月十九日，第 20 页。
⑧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不列号，同治九年五月间，第 12–13 页。
⑨ 顾文彬：《顾文彬日记》，同治九年五月二十日，第 21 页。
⑩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十号，同治九年五月十四日，第 14 页。
⑪ 顾文彬：《顾文彬日记》，同治九年五月廿八日，第 22 页。

子，并写明相应的价值及处置策略。①

六月初一日，顾文彬仍到吏部投供，并拜见老师官文，相谈良久。次日，他带着沈周的《吴中草堂》，去松筠庵见心泉和尚，再度观摩心泉收藏的智永《千字文》，双方议定 150 两转给顾文彬，顾文彬当即携归。但在初四日，他就送还心泉，原因是手头缺钱。② 心泉尽管富于收藏，精于赏鉴，但因境遇所困，所藏书画大半散去。顾文彬未能得手的，仍是智永《千字文》卷。③ 他非常担心离京后，这一奇珍会落入他人之手。④ 次年四月，他委托朱研生与心泉商量，仍以此前议定的 150 两之价购得。顾文彬迷信地认为，翰墨因缘也有前定。⑤ 顾文彬叮嘱顾承，必须只在顾家秘藏，切勿轻出示人。⑥ 顾文彬晚年撰写的《过云楼书画记》中，就将智永《千字文》置于第一位予以介绍，论其为旷世奇珍。⑦

到六月上旬，他新买的书画中令人兴奋的还是不多见，手头让他满意的仍是这三种：北宋拓定武兰亭卷、恽寿平题王翚十万图册、王孟端山水卷。⑧ 顾文彬深知在苏、在京的开销都很大，他的因对之策，就是在书画收贩上推陈出新，注意贩销家藏的二三等货。通过这样的方式，生活开支与收买书画都可望有相对稳定的经济来源，也为他的候缺活动提供经济支撑。到八月间，顾文彬将在北京的收获列了一个清单。当中的个别作品，在市场上被误认伪作（如王翚的仿古山水小册、唐寅的墨石菖蒲轴等），所以价格低廉，让他捡了漏。在给顾承的信中，他对在京的收支情况作了一番统计，收买字画、玉器、铜器、古钱、绫本字画等，约费四百七八十两，四个月的在京生活费用一百数十两，还短缺了二百两左右，都是向叶恒泰挪借。⑨

按顾文彬的要求，顾承检选相应的书画寄往北京。在京城不断出入古董书画铺的过程中，顾文彬有失也有得。德宝斋待售的徐渭粗笔人物册八页，初始因是熟纸被视为赝本，后来再度鉴定，才确认为真迹。他又感叹说审定书画之难如此，总是不能掉以轻心。⑩ 确实，除了顾文彬本身在书画方面所具有的学养外，顾氏交往圈中那些志同道合者的帮衬，⑪ 同样重要，共同支撑起了顾氏丰富的书画收藏世界。

顾文彬当然会考虑官缺的优劣与顾家生活的关联，既重视收益的问题，也注意与苏州远近的关系。七月间放出的山西河东道缺，是个好缺，可惜顾文彬没有得到。但他听说陕西潼商道吕曼叔病故，空出一缺，可能也会很快放出来。有些放出来的官缺，俱不见佳，顾文彬并不希望落到自己身上。⑫ 到九月，又连出三缺，都是补各缺所在的本省之人。顾文彬认为，云南盐道可以不去，陕西潼商道也可不去，但山西河东道可是好缺，却没有到手。顾文彬表示这个官缺离家太远，但顾承说只要缺好，不在乎远。顾文彬的想法，还是纠结于离家远近，要考虑回家便捷的问题。由于大半年时间一直在候缺中度过，顾文彬有些失望，照这样下去，有可能要在北京过年，所以他开始交待顾承将大毛衣服寄来北京。⑬

闰十月初一日，顾文彬从张慕知那儿得到确信，闰月不投供，这多少令他有些失望。可是

---

①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十一号，同治九年五月十四日，第 16–17 页。

② 顾文彬：《顾文彬日记》，同治九年六月初一日、初四日，第 38–39 页。

③ 顾文彬：《顾文彬日记》，同治九年六月廿七日，第 29 页。

④ 沈慧瑛：《从〈过云楼日记〉看晚清士绅生活图景》，《档案与建设》2015 年第 8 期。

⑤ 顾文彬：《顾文彬日记》，同治九年四月廿三日，第 88 页。

⑥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不列号，同治十年十月，第 89 页。

⑦ 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卷 3《画类三》，“王孟端山水卷”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103 页。

⑧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十二号，同治九年六月初三日，第 18 页。

⑨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不列号，同治九年八月，第 25–27 页。

⑩ 顾文彬：《顾文彬日记》，同治九年十月廿四日，第 39 页。

⑪ 沈慧瑛：《从〈过云楼日记〉看晚清士绅生活图景》，《档案与建设》2015 年第 8 期。

⑫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十七号，同治九年八月二十五日，第 28 页。

⑬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十八号，同治九年九月望日，第 29 页。

到了二十日，终于等来了令顾文彬无比满意的官缺，补授浙江宁绍台道。[①] 这在顾氏看来，各省道缺离家最近而最合适的，无过于此，可谓天从人愿。领完凭证后，他就可以起程南返了。时值北方寒冬，朱研生夫妇想留顾文彬在京过年，但顾文彬已不想再待在北京了，他告诉顾承："出京费用约须三四竿，别敬与盘川买物，各居其半，汝须预为地步。"这笔开支，顾文彬提出向他的同道好友也是亲家吴云、李鸿裔、盛康各借一竿，根据他现在官场发展的情形，他们不会不借的。同时嘱咐顾承，因宁绍台道要管摄海关诸事，需要人手帮衬，人选问题要等他回家再议，相应的幕友与家人也需要酌定。[②]

从获得宁绍台道的官缺后，顾文彬在京需要完成必要的应酬工作，答谢、拜谒师友，如许庚身、沈桂芬、宝鋆、文祥、恭亲王、官文、毛昶熙、赵菊生、许玉瑑（号鹤巢）、李鸿藻、龚自闳、叶衍兰、徐用仪、王书瑞、顾允昌、朱玉圃、钱宝廉等人。这是个人经营社会网过程中的自然表现，其中也少不了礼物的馈赠。当许庚身提出要看顾文彬收藏的宋拓《九成宫醴泉铭》时，顾文彬就直接将它送给许氏了。[③] 官场中的迎谒与礼敬，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京中公请顾文彬之宴非常多，有数十场，顾文彬每天进出京城，奔波劳碌。其实在顾文彬心中，对宁绍台道职位有多少实际好处，还存有疑虑，且众目眈眈，将来礼敬断不能省。[④] 事实上，清代沿海的各关道中，除上海道外，就以宁绍台道为最佳，是著名的美缺。[⑤] 顾文彬还说，在京多住一日，就多一日之费，拟于十一月十八这个吉日起程返苏。[⑥] 顾文彬是一个比较有时间观念的人，在京的最后几天他都在应酬、辞行，十八日中午就动身南还。[⑦] 次年顾文彬到宁绍台道任上后，他才真正觉得这是宦游生涯中的最得意之事，[⑧] 让他感到人生无比快慰。

四、苏州育婴堂事务的调处及其情绪表达

在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地方政治与社会重建的任务繁重，人际关系也显得更为复杂。调选得力的官员与绅士承担战后的重建与善后工作，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是彼时的政治大势。[⑨]

顾文彬在家书中屡屡提及的苏州育婴堂，在地方政治生活中已具有关键性的角色，各类堂务成员的利益诉求也充斥其中。育婴堂始建于康熙十三年（1674），到清末已具有浓郁的官方色彩，配备官府、绅士阶层、地方田产、沿江沙地等众多资本支持，拥有 4222 亩苏州长、元、吴、江四县田产以及 11400 亩江阴、常熟、海门三处沙田，规模较大。[⑩] 同治六年顾文彬正式接手育婴堂的管理工作后，将广仁堂的资产和业务都附入育婴堂名下。[⑪]

育婴堂不仅是地方倚重的慈善工作，而且成了某种程度的赢利单位。顾文彬北上后，希望在苏州的操持者将日常经营的账目尽快完工，力求清楚。因为他担心在京太久，必定有人觊觎此堂。顾文彬最担心的，是程味亭乘他不在苏州而有专擅之举。这种人际关系在关键人物缺席

---

① 顾文彬：《顾文彬日记》，同治九年闰十月初一日、二十日，第 42、43 页。
②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二十四号，同治九年闰十月二十日，第 38–39 页。按，竿可能是"千"的代称。
③ 顾文彬：《顾文彬日记》，同治九年闰十月廿一日、廿二日、廿九日，第 43、45 页。
④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二十五号，同治九年闰十月二十五日，第 39 页。
⑤ 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下，"外官廉洁"条，中华书局，1984 年，第 60 页。
⑥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二十五号，同治九年闰十月二十五日，第 39–40 页。
⑦ 顾文彬：《顾文彬日记》，同治九年十一月初九日 – 十八日，第 47–49 页。
⑧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十八号，同治十年六月初十日，第 58 页。
⑨ 曾京京：《复员绅士与太平天国后常州的重建》，《安徽史学》2013 年第 4 期。
⑩ 范金民：《晚清江南士大夫的致仕生涯——以顾文彬为中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1 期。
⑪ 黄鸿山：《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以晚清江南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226 页。

后，很容易出现的紧张与分裂感，在很多地方应该都是正常的表现。但顾文彬在家书中向顾承指出，只要银钱不落他手，堂中诸事让他做主，也无关大要。同时顾文彬一直注意顾家经营的其他事务，包括常熟典当的经营问题，亲家吴云能否帮衬，老友盛宣怀曾否回苏等问题，五月正是一年期满的时候，也须结账了，提醒顾承注意核算，以及他与吴云、盛宣怀等人的分红问题[①]，以期更好地维持他们的利益分配与顾家的人际网络。

有关育婴堂工作的处理问题，顾文彬在家书中屡次提及。人际关系的叙述，在以往有关慈善组织的研究中，[②] 其实是比较缺乏的。在战后地方的重建与发展过程中，善堂经营显然有了更多的利益之争。顾文彬向顾承交待的育婴堂事务，能具体而微地呈现组织运作中的人事实态。

顾文彬对程味亭多次表达过厌恶的情绪。顾文彬自认其长期在外，不可能亲理婴堂事务，所以觉得婴堂管理迟早会换手，不管由何人接手，银钱出入账目首先要掌握好，是至为要紧的工作。[③] 到六月初，顾文彬写信给顾承，一直追问婴堂历年的出入账目是否结清等问题。[④] 顾文彬对育婴堂工作的管理和接续，其态度、立场仍是清楚的，绝不愿意让程味亭接手垄断。不过程味亭在苏州的慈善事业圈中颇有影响，他从业贾起家，以多行善举与谢家福、沈锡祥等人都被称为善人。[⑤] 由程味亭接手管理工作是很有可能的，但这是顾文彬不愿看到的结果。

育婴堂工作的结算，到七月间已有眉目。顾文彬要求顾承尽快将账目理清，同时密信苏州知府（时任知府为李铭皖，七月下旬之后由蒋启勋接任），建议另举公正绅士接任，迅速将程味亭排除。[⑥] 这种人际关系的紧张，体现出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地方社会重建过程中出现的利益争夺及其复杂性，非仅育婴堂为然。

家人参与地方上的琐事俗务，一直让顾文彬烦心，但可能也是必要的社会参与工作，有利于嵌入地方公共场域及其话语表达，维持顾家在地方社会中的角色与地位，所以顾文彬在尽力安排好北京的活动时，仍以极大的耐心对家事进行指导、调处。[⑦]

八月份给顾承的家书中，他提及缺乏经验的大孙（顾麟祥）参与育婴堂工作后，必然会与程味亭产生纠葛，而且根本斗不过老奸巨猾的程味亭。加上顾承想去南京参加乡试，更让大孙无所依傍，这对顾家在地方公事中的地位与角色将会产生不利的影响。而且他非常担心，年少的大孙得罪了老辈的程味亭，不管是非如何，从伦理而言，必会引起大众非议，当中程味亭再予挑唆，苏州官绅反以顾家为不是。这是顾文彬极不愿意看到的势态。[⑧]

顾文彬后来获悉，在苏州育婴堂事务的纷争中，主持调处工作的冯桂芬令他失望了："堂事已交新董，交出之时，味老在场，并无烦言，事后又在校邠处说出二分生息之议，并欲上控，其为挟制，显而易见。校邠素来胆小，为其所吓，致有自愿认还女堂一分利之说。"这其实是顾文彬预料的情况，程味亭一定会在生利层面发难。[⑨]

顾家从事的典当业，顾文彬在家书中也是不厌其烦地提及，应该如何处置，自有其经验和策略。他比较信任的亲家吴云，是照应顾承工作的关键人物。总的期待，短期经营是有亏

---

①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十号，同治九年五月十四日，第 14–15 页。

② 有关育婴堂的相关研究，可参星斌夫：《明清時代社会經濟史の研究》，国書刊行会，1989 年；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同朋舍，1997 年；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 年；黄鸿山：《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以晚清江南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年。

③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十一号，同治九年五月二十日，第 15–16 页。

④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十二号，同治九年六月初三日，第 18 页。

⑤ 民国《吴县志》卷 70 上《列传・孝义一》，第 45b 页。

⑥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十五号，同治九年七月十四日，第 22 页。

⑦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十六号，同治九年七月，第 24 页。

⑧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十七号，同治九年八月二十五日，第 27–29 页。

⑨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二十一号，同治九年十月二十一日，第 32 页。

损的，但按三年规划来看，当有盈余，是有益无绌的。而育婴堂的工作，因程味亭一直在作梗，令经手堂事工作的顾承十分为难，顾文彬认为："此人外强中干，我料其断不敢发。"程味亭拖欠过婴堂 153 两，未曾开于账上，但借券还在，顾文彬提醒此券不能给他，要留作涉讼把柄。育婴堂分男、女两堂，比较而言，女堂稍有赢利，顾文彬希望他的建议能予实施，即由冯桂芬自认一分之利作为捐款，则两堂皆有生利，比较持平，只是不知冯氏是否肯办。①

此后的家书内容也很长，主要就在与顾承讨论育婴堂事务安排过程中如何应对程味亭等人的作梗为难问题。可以说，整个同治九年，顾文彬关心的苏州地方家事与俗务中的一大牵挂，就是育婴堂的工作。也可能这是顾家在地方公共事务中的核心利益所在，会影响战后顾家的重建及在地声望。所以，远在京城的顾文彬，尽可能通过家书中的详细述说和爱憎表达，传送给顾承，并传递到相关朋友那儿，他的态度与立场能被理解和容受。

顾文彬与程味亭其实是总角之交，本不希望因小辈的矛盾，使冲突升级而更为难堪。这是顾文彬处理与程味亭矛盾的过程中不够干脆的地方。他知晓程味亭的作为，不管婴堂银钱，但非要管账目，令人疑惑。由于顾文彬长期在总董任上，育婴堂的拓展，有超出可控的程度。董事与司事也在取钱与不取钱上有所分别，"今取钱则争肥于司事，办事则自居于副董，亦不知耻矣"。顾文彬关注着育婴堂的人事更替，除了担心顾承与长孙在当中有可能遭遇刁难外，其实更可以表明他积极参与地方事务的意愿，极为在意他在地方公共事务中的地位与角色。②

五、家业保存和讲究书画的要求

顾文彬应付地方公事与家事的问题时，有着成熟的技巧和丰富的策略，了解同辈士人的优劣所在，都构成了顾文彬对于所处时代应有的知识。这种知识，是有条件的，有赖于历史、地理、阶级关系等中的位置，也提供出解释其话语环境的各种意义。③ 在与顾承的通信中，顾文彬即以其知识释放出具有决定性的意见。

经历了战争的重大创伤后，顾文彬更为关心家族重建与家业保存的问题，核心就在孙辈科考和家教工作。其具体实践可谓晚清士绅家庭生活的一个缩影，④ 除了要求孙子们用功不可放松，适时把握时机外，他明确规定，每月顾承要安排六期功课，讲究书画，必须抓紧实施。他的归期根本无法确认，家中女眷的生活、疾病的医治、门户的看护等，都赖顾承独当一面，疏忽不得。为此他提醒身体素弱的顾承，需要时时在意保健问题，以利于应付各种事务时有较好的精力和清醒的意识。⑤ 不过可惜的是，顾承自十四五岁起就得了便血之症，并伴其一生，严重损害了顾承的健康，后来于光绪八年过世。这让顾文彬无比伤痛。⑥

顾文彬关切孙子们的教育问题，孙辈能否安分读书这样的表达，常见于他的家书写述中，也说明孙辈的学习，包括苏州顾家的家族建设、家庭教育、生活安排和矛盾处理等，并不让他放心和满意。这是他作为年事已高的家主所时刻忧怀的大事。这些思考，关涉修身与经世的重要问题，也契合晚清理学思想的发展路向。⑦

顾文彬在家书中向顾承强调孙辈的学习，重视书画功夫的训练，必须依其要求执行。估计

①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二十二号，同治九年十月二十四日，第 33–34 页。
②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不列号，同治九年闰十月，第 36–38 页。
③ 露丝 · 沃达克：《话语、政治、日常生活》，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58 页。
④ 施林霞：《顾文彬的家庭生活研究——以〈过云楼家书〉为中心》，《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9 年第 4 期。
⑤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九号，同治九年五月初四日，第 11–12 页。
⑥ 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卷 6《画类六》，第 217 页。
⑦ 李细珠：《理学与"同治中兴"——倭仁与曾国藩比较观察》，《学术月刊》1999 年第 3 期。

在苏州家中时期，他会亲力亲为，教导孙辈的学习；离开苏州后，这个教育的重任，就落在了顾承身上。顾文彬要求顾承亲自负责讲论，包括人物、书法、画理到价值各方面："每月六期，按箱挨次将字画每期取出十件，令四孙环侍，汝与讲说，先论其人，次论其书法、画理，再论其价值。四孙各立一册，将所讲十件详记于册，自书分执。行之一年，必皆成内行矣。"①

不到一周时间，顾文彬在另一通家书中，再次强调与孙辈讲论字画一节当赶紧实施，不可拖延，依照他所定的章程，即每月六期，每期看十件。②

顾文彬从顾承的回信中，捕捉到了那种迂缓、因循的信息，更知晓大孙（顾麟祥）不愿好好读书的事情，甚至提鸟笼、坐茶馆，非缙绅家庭子弟所宜，令他感到十分焦虑。五月中旬的家书中，顾文彬又详细表达了他的态度和要求，既有失望，又存希望。③

大孙随顾承参与了育婴堂的相关工作，但并不繁重，所以有终日闲荡的行径，这让顾文彬比较担心。他对子孙不肯读书的焦虑与担扰，以及风度、礼仪与教养的培育，是明清时期仕宦家庭生活中常有的忧虑所在，换言之，也是仕宦阶层对家世如何绵延问题的关切所在。

六月初三日的家书中，顾文彬又与顾承重提孙辈学习书画鉴赏的事情，无论是对家业保守还是书画买卖，都是用得着的。他认为顾家的财富积累，书画收贩是一大宗。他还向顾承例举北京一李姓的故事，其子弟也靠贩卖旧藏之物，大赚一笔，因而得以广置田产。顾文彬强调这都是讲究书画带来的益处，如果子孙培育中轻忽了书画功夫，那么他现在这么苦心搜罗与经营的书画事业，都会成为虚设。④

确实，从顾文彬苦口婆心的劝诫中，反映出一个重要的理念，即"前人是怎么看待读书这件事的，也反映了在他们看来，人们应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和什么时候看书"，⑤洋溢着实用主义的意味。实际上，这也是不同个体或不同类型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会拥有不同知识（社会分配）的一种表现。⑥顾文彬那种带有以藏治学、以藏经世的家训理念，最后在顾氏家族中形成了共同的思想体认。⑦

顾承本人其实怀有科举攀升的意愿，曾向顾文彬提及近期准备参加江南乡试的事情。这对顾家地位的抬升与家族建设而言，本是值得推赞的大事。但顾文彬表示了反对，一方面，准备科考要专心一意，需挪出大量的时间准备，另一方面他是担心这样一来，顾家在苏州就没有了可以让他放心的日常生活掌事人。⑧对顾承坚持的乡试请求，顾文彬是坚决不允，并多次表达了这样的理由：一是需要身体空闲、年纪小；二是举业功夫要深，准备不足，断无幸获之理；三是浪费盘缠事小，连考三场的压力，是顾承虚弱的身体无法承受的。而且，顾文彬对顾承违背其意的举动，显然已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准备以不孝的名义来惩罚他。但他终究担心七月中旬回复的这封信，顾承来不及收到，这有点让他无可奈何。⑨

或许顾文彬从顾承的身上，更能深刻地理解"成人"优于"举业"的意义，这在左宗棠等人的家教思想中也多可见到。⑩而顾文彬的思想更切合"入世"与实用性，他反复提醒顾承，孙

---

①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四号，同治九年三月十三日，第 5–6 页。

②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五号，同治九年三月十八日，第 6 页。

③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十号，同治九年五月十四日，第 15 页。

④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十二号，同治九年六月初三日，第 19 页。

⑤ 罗伯特 · 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萧知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43 页。

⑥ 彼得 ·L. 伯格、托马斯 · 卢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吴肃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59 页。

⑦ 陶大珉：《从过云楼到怡园：顾氏书画鉴藏及其艺术交往》，樊波主编：《美术学研究》第 1 卷，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471 页。

⑧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十三号，同治九年六月十八日，第 20 页。

⑨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十五号，同治九年七月十四日，第 22–23 页。

⑩ 吴根友、孔建龙：《"成人"优于"举业"——左宗棠〈家书〉的核心价值取向探讨》，《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1 期。

子辈的书画鉴藏知识培训是家业承继的关键和家业振兴的希望，但在顾承那边，可能得不到积极而有效的回应，让顾文彬持续焦急。[①] 这种性格或观点上的要求，如凡勃伦所言，一旦获得认可，成为生活中的权威标准与规范，就会在接受者那里引起反应，甚至成为思想习惯，并起到监视作用。[②] 这种效果，本是顾文彬在家教中所期望的。顾文彬在家书表达中，每每言及孙辈的教育，都有急切难耐之意，甚至有心灰兴索的情绪表达，当中固然有顾承等人并不切实执行的原因。[③] 直到晚年，顾文彬还常说书画收藏宜娱老，而且对顾氏世世子孙之学也有益。[④] 这可谓是顾文彬一生不懈的追求，是他的文化理想。

八月份，顾文彬已猜到顾承到了南京应考，来不及阻止，他回复家书时，考期也已结束，所以他说考试题目非老手及用功人是做不好的，估计顾承是考不上的，也不必介意。[⑤]

顾文彬认为，育婴堂事务交接后，顾承在苏州的空暇会多一些，可以将精力多放在孙辈的培育方面，包括书画功夫的讲究与书法大字、小楷的训练。[⑥] 顾文彬不仅遭遇到书画鉴赏方面孙辈难于领会的难题，而且书法的研习训练方面，顾文彬更有所虑。因为大字练习虽于社会应酬多有必要，但小楷却于科考书写直接有益，所以他建议必须加强小楷的训练。直到同治十一年他在赴任浙江后，仍不断叮嘱顾承要加强孙辈的书画讲习训练，并且一定要严格遵照他所拟定的章程进行，每月抽出几天，作为讨论书画之用，否则真的让他忧心家业将来如何保守。[⑦] 顾文彬家教方式的先行成功事例，就是顾承。顾承就是在他的安排下，自幼钻研书画，故能在鉴藏方面心领神会，得到时人的高度认可。[⑧]

到十月份，顾文彬仍是巨细无遗地在家书中叮嘱顾承如何处置各种事务，既有俗务，也有家事，更多的是子孙培养的要义，都关乎家业保存的基本道理。[⑨]

顾文彬还比较注意顾家宅第门户的安全，在家书中甚至会提及顾宅楼下备有通巷子的小门，要求顾承全部锁断；生人包括女客都不准上楼。家中佣人孙妈已被辞退，顾文彬觉得有些可惜，要求顾承对现用仆妇要以老实本分为重，[⑩] 才让人有安全感。

六、结语

太平天国战争后，江南很多家族、士绅都在谋求因应之策，既需要再建的过程，也需要新兴的机会。特别是在社会重建与政治延续的进程中，绅士的力量得到了较大扩张。[⑪] 顾文彬远较一般绅士拥有更多的政治交往关系，他的政治努力、经济支撑、家族教育、家业传承以及作为意义追求的书画鉴藏（某种程度上还是社会交往的媒介）等活动，都融汇成了社会资本，在社会转型与政治延续的进程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进京候选期间，顾文彬还要兼顾苏州顾家庞杂的地方事务，可谓紊而不乱、极具条理。这种能力也不是一般官绅所能达到的。而且，在战

①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十五号，同治九年七月十四日，第 23 页。
②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2019 年，第 165 页。
③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十六号，同治九年七月，第 25 页。
④ 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自叙”，第 3–4 页。
⑤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十七号，同治九年八月二十五日，第 27 页。
⑥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十八号，同治九年九月望日，第 30 页。
⑦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八十六号，同治十一年四月初八日，第 147 页。
⑧ 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卷 6《画类六》，第 214 页。
⑨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十九号，同治九年十月十一日，第 31 页。
⑩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二十一号，同治九年十月二十一日，第 33 页。
⑪ 徐茂明：《同光之际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秩序的重建》，《江海学刊》2003 年第 5 期；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 年）》，中西书局，2021 年，第 74–80 页。

后恢复时期，顾文彬有着作为一家之主常有的忧患意识。顾家既然在政界、商界与艺界有着多方面的卓越表现，名声震于苏城，那么必定会招人之忌，觊觎之匪人必多，① 所以他的家事安排与政治应对，有其相当成熟的认知和谨慎的策略，从而提供出政治脉动下士绅生活的重建实态。

同治九年，顾文彬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度过，这一年对他而言，显然意义非凡。一方面，作为即将起复的官员，顾文彬恢复与拓展了社会网络，重建其政界、艺界的力量；另一方面，透过那些从京城寄往苏州的家书，可以窥见江南家族复兴、秩序重建进程中父子两代人之间的思想沟通及其对于生活的认知和态度。作为媒介的家书，蕴含了特殊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涵。不同人物的书信，呈现的社会意义与文化意涵是不同的。倘要从前人的日常生活与思想活动中，去探求不同时代人们的生活实态与意义世界，私人书信的解读，仍然是比较好的一种研究方式。顾文彬的家书充满了各种事情的细节陈述，在叙事上十分可观。依靠这样的叙事，确实能够比较好地展现一个连贯、完整、全面、有始有终的生活意象，② 拓展了我们对于个体生活、群体社会的历史空间的理解，更有助于政治史与社会史研究的推进。③

顾文彬在必要的政务之余，其实已将自己置于晚清中国书画世界的意义之网上，并于鉴藏领域自视甚高，甚至直白地与顾承说“当今书画一道，我与汝既具空群之目，复为登高之呼，各处尤物不胫而走”，所以对他们父子开创的这一家族事业非常骄傲，亦非常珍惜，更期待孙辈能够很好地守成，“于举业之暇，讲究书画，乃切要之图”。④ 顾文彬的“切要之图”，当然是要为子孙将来的发展打下牢固的基础，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拥有较多的知识分配，真正确立顾家在晚清文化生活中的特殊地位。或许这就是顾家在同光时期再度振兴的重要策略，与江南很多家族依赖科举、仕途或商业经营的成就而达成家族成长的目标不同，顾家的重点就在文化地位的获取。这与顾文彬的人生追求是相契合的，并深刻影响了家族的未来发展方向。

同治九年在京候选不到一年的时期内，那种优游且不乏紧张的收贩活动，不过是顾文彬经年书画鉴藏包括贩售活动的日常建构表现，有其情感的投注与经济的思考。顾文彬虽然除了展玩书画，并无其他复杂的消遣，⑤ 但比较注意社会网的作用，如傅山那般，擅长利用各种资源去解决日常生活的各种问题，而且具有清醒的意识。⑥ 他后来认识到，至少在科考一途，孙辈的志趣与追求，已与他年少时最喜考、逢考必到的状态不同了，没有办法强求，⑦ 但他仍努力引导家族重视文化的追求，毕竟文化的意义较政治、经济更为恒久。

总之，重视晚清庞大的官员群体中独特个体的呈现，是我们理解那个时代官宦的文化活动与社会重建时，非常值得注意的生活表现。不同于一般的士人，顾文彬等人经历了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战事的巨大冲击，在其私人写述的生活史中，并没有明显的紧张和焦虑，依然维持着传统社会秩序和思想教化的常轨，“继续沿着其自身长期确立的利益所规定的路线发展”；⑧ 他们的现实思虑与生活实态，围绕着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切身利益层面，多与社会稳固与政治安定的需求相适应。这与所谓断裂社会状态下的士人生活，⑨ 包括政治意识、文化担当等，其实是一

---

①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四号，光绪元年正月十三日，第 472 页；第四十二号，光绪元年四月二十三日，第 508 页。

② 罗伊德 · 克雷梅：《文学、批评及历史想象：海登 · 怀特和多米尼克 · 拉卡普拉的文学挑战》，收入林 · 亨特编：《新文化史》，姜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98 页。

③ 刘萍：《家国之间——以李用清家书为基础的个人史研究》，《晋阳学刊》2021 年第 5 期。

④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二十一号，同治十年六月二十一日，第 62 页。

⑤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二十八号，同治十年七月八日，第 70 页。

⑥ 白谦慎：《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173 页。

⑦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第四号，光绪元年正月十三日，第 472 页。

⑧ 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第 10 页。

⑨ 王学文：《叶昌炽的历史世界：由〈缘督庐日记〉看晚清“断裂社会”中的传统士大夫》，《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6 年第 3 期。

致的，并没有显著的差异。他们为王朝的“中兴”作出了努力，与主流统治一样，强调传统制度的有效性。① 从顾文彬家书写述的私人领域出发，不仅可以窥探同光中兴时期士人生活的轮廓面貌，而且可以进一步深入体察当中呈现的士人理想追求、社会生活的波澜和大时代的脉动。

References

Gao Fumin. *Guoyunlou meng: da biange shidai Jiangnan wenmai zhi yiyu* (The history of Guo YunLou: a perspective of Jiangnan culture in the era of great change). Shanghai: Wenhui Chubanshe, 2017.

Huang Hongshan. *Zhonggou jindai cishan shiye yanjiu: yi wanqing Jiangnan wei zhongxing* (The studies of China's modern charity: a study centered on Jiangna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ianjin: Tianjin guji Chubanshe, 2011.

Mary Clalaugh Wright. *Tongzhi zhongxing: Zhonguo baoshou zhuyi de zuihou dikang (1862-1874)*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2002.

Fan Jinmin. " Wanqing Jiangnan shidaifu de zhishi shengya:yi gu wenbin wei zhongxing (The retired life of late Qing Jiangnan literati: a case study based on Gu Wenbin)" *Hebai shifan daxue xuebao*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2021).

Kan Hongliu. "Chong Gu wenbin riji kan wanqing liulichang shuhua wenwan jiaoyi (On the Liulichang business and cultural exchange during late Qing period from the Diaries of Gu Wenbin) " *Beijing shehui kexue*(Social Sciences of Beijing) 5(2022).

Shen Huiying. "Jiedu guoyunlou jiashu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house of Guo-Yun-Lou Letters)." *Dangan yu jianshe*(Archives & Construction)4(2017).

Shen Huiying. "Guoyunlou zhuren guwenbin jiashi kaolue (A brief study of the house of Guo-Yun-Lou Owner Gu Wenbin's family history." *Dangan yu jianshe*(Archives & Construction) 1(2018)

Shi Linxia. "Gu wenbin de jiating shenghuo yanjiu:yi guoyunlou jiashu wei zhongxing (A study on the Daily of Gu Wenbin:taking Guoyunlou Letters as the Center)." *Kaifeng jiaoyu xueyuan xuebao*(Journal of Kaife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4(2019).

Zhou Wu. "Taiping jun zhangshi yu Jiangnan shehui bianqian (Battles by Taiping Army and the social changes in south of Yangtze River)." *Shehui kexue*(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1(2003).

The Candidates for Official Vacancy, Family Re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Pursuit of Gentry in Jiangnan after the Taiping Rebellion: Gu Wenbin's Family Letters in 1870

FENG Xianliang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dan University; vonxl@163.com)

Abstract: In 1870, the ninth year of the Tongzhi reign, Gu Wenbin, a Suzhou gentry, went to Beijing to start a long campaign as a candidate for office vacancies. That year Gu wrote a total of twenty-nine letters, which were rich in content, including Gu Wenbin's detailed descriptions of waiting for the vacancy,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collecting and selling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s, the handling of the affairs of the Suzhou Orphanage, the arrangement of Gu's family affairs, and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grandchildren to study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These were important expressions of Gu Wenbin's communications and his conception of family. The year of 1870 was a crucial year for Gu Wenbin to rebuild his family in Suzhou after the Taiping Rebellion, laying an important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restoration of Gu's official position, the preservation of his family property, and his collection in the Cloud Tower. Starting from the private sphere described in Gu Wenbin's family letters, we can see the unique features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an official career after the rebellion and daily life in the political continuation, and we also can further observe the ideal pursuit of scholars and the pulse of an important era.

Keywords: the ninth year of the Tongzhi reign, Gu Wenbin, candidate, family reconstruction, social changes

① 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年，第 477 页。